

全球在地化、事件与当代北欧生态文学批评

何成洲

摘 要:生态意义上的全球在地化其实就是思考全球化,行动在地化。这引出两个话题,一是如何继承和发扬本地的传统文化?二是如何将全球化与环境的议题在地化?这可以从北欧生态文学的全球在地化获得一些答案。山妖是北欧文学的一个神话原型。20世纪80年代以来,北欧文坛上出现了一些重写山妖的虚构作品,如瑞典的《天沟森林中的绿林好汉》,芬兰的《山妖:一个爱的故事》。在这些作品中,山妖被用来构建新故事,生成了全新的文学话语。《天沟森林中的绿林好汉》启示人们,一个人的动物本能对于理解人的行为是至关重要的。《山妖:一个爱的故事》以后现代碎片化的叙事方式,讲述山妖故事,影射生活在都市中的动物境况。这部芬兰语小说启发人们,动物性其实是人类的一个话语建构,文明和自然的划分是人为的而非本质性的。北欧山妖叙事的破旧立新,受到全球化的深刻影响,也深深打上了北欧文化的印记,反映了全球在地化的文化特点。

关键词:全球在地化;北欧文学;山妖;生态批评;天沟森林中的绿林好汉

中图分类号: I109.5;I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7320(2018)02-0057-08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11&ZD137)

全球在地化(glocalization)是20世纪90年代才出现的新词,它是全球化(globalization)与在地化(localization)两个词的结合。它最初产生于商业领域,相对于全球化的潮流,在地化是指任何一种经济活动或商品流通,必须适应地方需求,为某一特定文化或语言地区所接受,才有可能快速发展。因而,全球在地化是指在全球化与本土化之间取得一种新的平衡,当全球化趋势看上去势不可当的时候,在地化是一个与之相依存的制衡力量。“全球在地化是全球化通过本土产生的折射。本土没有被全球化消灭、吸收或者摧毁,相反本土影响了全球化的最终结果。”^[1](P65)全球在地化重视本土的视角、体验和实践,全球与在地的复杂联系可以用“全球在地性”概括。“全球在地性是指在本土或者通过本土视角来体验全球化,本土视角包括当地的权力关系、区域政治、区域地理,文化独特性等。”^[1](P68)社会学家罗伯特森(Roland Robertson)将这一概念引入社会和文化领域。他1992年在著作《全球化:社会理论与全球文化》中认为,全球在地化强调全球化和本土化的同时性和共生性。在谈到现在随着卫星电视的普及人们可以足不出户而知道天下大事时,罗伯特森指出:“这种想法是有严重问题的,因为它没有充分考虑到‘本土’和‘全球’之间日益复杂的关系,没有充分认识到‘在地性’总是被选择的,而且也没有能够把握‘本土’媒体,尤其在美国,越来越多地报道‘全球话题’的大趋势。”^[2](P174)

就生态批评而言,全球在地化不仅指全球性的生态问题如何影响一个地区和那里的人民,而且也可以指不同地区的人民如何从本土的历史经验出发来反思和应对这些生态问题。因此,全球在地化其实就是思考全球化,行动在地化。北欧国家有着悠久的文化传统和特殊的地区身份认同,全球化产生的生态问题影响了北欧,也引起北欧思想界的积极反思。北欧有着丰富的生态哲学和文学资源,产生过一大批伟大的生态思想家和经典的文学作品。众所周知,深层生态学是当代生态思想的一大支柱,它就是由挪威著名哲学家奈斯(Arne Naess)在1973年提出来的。同深层生态学相对应的是浅层生态学,后者的

主张是发明新的技术,实施更加严格的环境管理,制定环境保护的法律来控制 and 减轻污染。与浅层生态学不同,深层生态学从一开始就提出反人类中心主义的鲜明立场,要求全面彻底地清算造成环境危机的思想根源和文化传统。在《深层生态学的基础知识》一文中,奈斯曾提出他的八点主张,下面引用其中的两点。“第一点:地球上人类与非人类生命的繁盛有其内在的价值。非人类生命形式的价值不取决于他们是否从人类的角度来看是有用的。第二,生命形态的丰富和多样性本身就具有价值,而且他们对于地球上人类和非人类生命的繁盛做出了贡献。”^[3](P68)仅从以上这两点就可以看出,奈斯的生态哲学是从人类文化和文明的高度来看待生态危机,并提出系统的思考和理论建构。相对于生物多样性,文化多样性也非常关键,需要警惕文化全球化的负面影响。

从全球在地化视角研究当代北欧生态文学需要正视两个重要的问题:一是它如何继承和发扬北欧的传统文化?二是它如何将全球化与环境的议题在地化?当代北欧文坛上曾出现一些作品,它们挪用和改写了传统山妖形象,这些作品充满了神秘的本土色彩,对全球化进程中的科技、自然、动物、森林和文化等既具有普遍性又含有北欧特殊性的问题加以反思,彰显了全球在地化的北欧生态文学特色。在具体讨论一些当代北欧生态文学作品之前,有必要先考察一下北欧的山妖神话传统及其流变。

一、北欧的山妖神话及其文学传统

北欧古代神话中有一个独特的半人半兽形象,叫做山妖,不但在北欧家喻户晓,而且为世界各地的人所熟悉,成为北欧文化和民族身份的一个象征符号。山妖在北欧五国语言中的拼写有一些差别,但是在英语中一般统一翻译成“Troll”,中文翻译除了“山妖”,还有“巨人”“巨怪”等。冰岛著名长篇神话故事集《萨迦》中有很多山妖的故事,其中《大力士葛瑞底尔传》讲述这样一个故事:亡命好汉葛瑞底尔为躲避仇家的追杀,隐居山林,终日与山妖打交道。有一次,葛瑞底尔与凶狠的山妖之妻恶斗,山妖婆力大无穷,凶猛无比。葛瑞底尔利用计谋将其制服,推下海湾。还有一种说法是,女山妖先是被葛瑞底尔削去肩膀,然后遇见阳光,化为独臂的山妖妇石像。这可以算得上是北欧神话传说中山妖遇光化为石的一个例子^[4]。冰岛史诗《埃达》中也有许多对于山妖或巨人的描述,例如第15首《海尔吉·希奥尔瓦德松谣曲》中多次提到巨人,王子海尔吉英勇无敌,杀死了巨人哈蒂。哈蒂的女儿,女巨人里姆盖德想替父报仇,却中了国王臣子阿特里的计谋,被阳光照耀变成了石头。

如今天光已破晓,里姆盖德,
阿特里我一直陪你闲谈聊天,
因为你见到阳光就必定死亡。
顷刻间你变成一块坚硬石头,
将成为港湾岸边可笑的标志。^[5](P247)

国王的长子赫定在旅途中遇到了骑狼的女巨人,她手持蟒蛇当缰绳,希望赫定当她的伴侣。赫定拒绝她之后,被其诅咒,未得善终。

山妖的故事在北欧源远流长,北欧各国神话里的山妖形象也有所差异。在阿斯比昂森与莫尔所编纂的《挪威传说》中,山妖就与冰岛传说中的山妖不同。《挪威传说》中的山妖都比较愚钝,在与人类的交往中屡屡受挫,最终丢掉生命,例如《布茨与山妖》这一故事。布茨是一位农夫的小儿子,在农夫去世之后,布茨跟随两位兄长去服侍国王。宫里众人皆赞赏布茨伶俐,这激起其兄长的嫉妒,后者遂在国王面前进谗言,让布茨去宫殿对岸的山妖宫中偷取各类金银财宝。布茨巧妙地哄骗山妖吃下自己的女儿,导致他伤心悲痛炸裂而死。由于山妖的愚笨,布茨成功完成任务,最终确立了自己在国王宫中的地位。

在北欧文学史上,山妖是一个反复出现的神话原型,在不同时代被作家赋予了新的内涵^{①[6]}(P104-122)。在易卜生创作《培尔·金特》之前,丹麦与普鲁士之间爆发了战争。作为丹麦的兄弟,挪威没有支持

①关于北欧神话和文学史中的山妖形象,详见 J. Lindow. Troll: An Unnatural History. London: Reaction Books, 2014.

丹麦,而是选择了旁观,这引起易卜生的强烈不满。在这部戏的第二幕,培尔因为拐骗别人的新娘而被整个教区的人追捕,他逃进了深山,遇见了山妖大王的绿衣公主。为了保存自己,他被迫答应山妖大王,作他女儿的丈夫。“培尔:当然了。为了把一位漂亮新娘娶到手,做点牺牲也是值得的,何况她还给我带来一个模范王国呢。”^[7](P183)不过他马上又后悔了,几乎被小山妖们挖了眼睛。在这里,培尔面对山妖们苟且妥协的情景,被易卜生用来讽刺挪威的国民性。与易卜生同时代的伟大挪威作家约纳斯·李在1891年发表了自己的小说《山妖》,讲述了挪威北部的山妖传说和故事。

瑞典童话女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塞尔玛·拉格洛夫的小说《山妖与人类》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住在森林里的一对山妖夫妻碰巧捡到附近村庄里的一个孩子,便留下自己的孩子,而将人类的孩子带走了。那位丢失孩子的母亲不顾丈夫的反对和村民们的攻击,收养了山妖的孩子,给了他母亲般的关爱。在人类母爱的感召下,山妖夫妇决定将人类的孩子送回来。超越人与山妖界限的母爱,体现了人类与动物在很多方面类似。拉格洛夫是一个讲故事的能手,在她的诺贝尔演讲辞中也充分展示她讲故事的才能,她提到了孩提时代听过的很多故事,其中就有不少关于山妖的。她说道:“想一想那些老人,坐在森林边上的小草房里,讲述女水妖和山妖的传说,还有妇女被拐进大山里的故事。是他们教会我诗歌怎么才能传遍莽莽群山和一望无际的大森林。”^[6](P120)

山妖在北欧文学中是一个神话原型,通常代表邪恶、黑暗以及人类需要克服的弱点。弗莱认为,各民族的文学都从自己的古代神话中吸取了营养,这不仅表现在文学的形式上也反映在作品的主题上。“每一个人类社会都拥有属于自己的神话,它由文学延续,通过文学传播,并因文学而变得多样化。”^[8](P xiii)文学的原型批评试图发现文学作品中反复出现的各种来自神话传说的意象、叙事结构和人物类型,找出它们背后的基本形式,在作品分析中强调在具体的社会和历史语境下探讨神话原型的连续性。神话原型的视角有助于研究当代北欧文学中山妖形象的塑造,但是也许并不能充分解释这些作品如何在当下的全球化语境下被挪用和创造性地运用。

20世纪80年代以来,北欧文坛上出现了一些重写山妖的虚构作品,如瑞典的《天沟森林中的绿林好汉》(1988)、芬兰的《山妖:一个爱的故事》(2000)等。在全球化时代,虽然北欧人口数量相对较少,但是这些北欧的优秀文学作品一经翻译成英语等主要语言,便很快在世界流传。在这些作品中,山妖被用来构建一个新的故事,生成了一种全新的文学话语,表达了对于全球化时代生态危机的反思和批判,体现了改造世界的积极诉求。这一文学的生成和互动过程被称为“文学的事件”。

英国文学理论家阿特里奇(Derek Attridge)在《文学的独创性》(2004)和《文学的创作》(2015)中提出,文学事件的理论主要包括三个相互关联的层面:他者性、创新性和独特性,它们关系到文学创作和接受的过程^{[9][10]}。“他者性产生于对新思想和感觉的理解;创新是生产艺术作品的过程以及在阅读中对这个过程的追寻;独特性关系到一部作品独特身份的形成。要将一部作品完全当作文学来看待,我们需要去体验这三个方面,因为它们在一场独特的复杂运动中相互协作、相互加强。”^[10](P58-59)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之所以被阅读、翻译和传播,是因为它给不同文化的读者带来新体验。文学给个体读者和整个社会种下诱变的种子,在私人和公共领域都成为一种生成性事件,文学变成有目的的行动。

结合当代北欧文学中的山妖作品,神话原型的叙事被建构成一个个生成性的事件。山妖以不同的形象在不同时期重复出现,这反映了北欧社会在全球化时期的生态诉求。在这些作品中,叙事不是描述过去,不是仅仅重复这个神话故事,而是“以小说行事”^[11]。关于叙事的功能,齐泽克在《事件》中说道:“主体性发生真正转变的时刻,不是行动的时刻,而是作出陈述的那一刻。换言之,真正的新事物是在叙事中浮现的,叙事意味着对那已发生之事的一种全然可复现的重述——正是这种重述打开了以全新方式作出行动的(可能性)空间。”^[12](P177)当代北欧山妖文学的一个重要的主题是批评全球化给人类生存环境带来的挑战,谴责人对于自然和森林的破坏,倡导动物的伦理,推动人与环境的和谐相处。而如果把把这些作品当作一个总体来看,笔者认为它们构成一个动态的、有差别的,但是有共同主题的一系列事件,凸显了全球化语境下文学,尤其是生态文学的行动力量。

二、人性还是动物性:《天沟森林中的绿林好汉》

《天沟森林中的绿林好汉》^①[¹³](P592)的瑞典语原名是“Rövarnai Skuleskogen”,1998年由安娜·帕特森翻译成英文在伦敦出版,题目改成了“The Forest of Hours”。它的作者埃克曼(Kerstin Ekman)在20世纪50年代开始文学创作,一度成为瑞典侦探小说的代表人物,这方面的主要作品包括《三十公尺谋杀》(1959)和《死亡之钟》(1963)等。她最负盛名的四部曲——《巫婆舞圈》(1974)《源泉》(1976)《天使之屋》(1979)和《一座光明的城市》(1983)——从不同的角度描写了瑞典一个小镇的历史变迁。1978年,埃克曼当选瑞典文学院院士,是瑞典当代的代表性作家之一。

《天沟森林中的绿林好汉》的主人公是一个山妖,名字叫“斯科德”。他原先生活在天沟森林,遇到两个人类孤儿,同他们交了朋友,慢慢学会了人类的语言并适应了人类的生活。之后,从中世纪一直到19世纪的五百年中,斯科德生活在人类中间,经历了瑞典历史上无数与世界历史进程相关的重大事件,比如与俄国的大北方战争和黑死病。他自己从事过牧师、钟表匠、外科医生等不同的职业。但是他总忘不了天沟大森林,时不时地回到那里,对神秘大森林一直怀有亲切的感觉。尽管他身上的动物性不断地减少,越来越像人那样文明,但是他仍然具有与动物沟通的本能,而且还能如神话里的山妖那样操控其它动物或者物体。生活在人类中间如此长的时间,斯科德的情感世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感受到了爱,并愿意为爱奉献一切,这让他成为一个更“完全”的人。斯科德500年生命历程的言说将虚构和历史结合起来,在世界历史的进程中反思人性和动物性相对立的问题。在《从动物研究到动物性研究》一文中,伦布拉德(Michael Lundblad)是这么解释动物性研究的:“动物性研究将人的政治放在优先的地位,比如,我们在不同的历史和文化时期是如何考虑人类与非人类的动物性的”^[14](P497)。动物性研究从全球和本土的双重视角讨论人类对于非人类动物的看法和态度。《天沟》小说的动物性叙事呈现去他者化的特点。

首先,在北欧神话中山妖经常代表恐惧和危险,是人类的对立面。然而在《天沟》这部小说里,读者在斯科德的讲述中,认识到他丰富复杂的内心世界,进而改变了对于动物的成见。“埃克曼借助她的山妖主人公斯科德打开了一扇通向动物世界的想象之门:想象它们的想法、感受及语言。”^[15](P425)这部小说的叙事是非常激进的,让斯科德作为主人公本身就是对于传统的反叛。其次,作为一个生活在人类与自然之间的生物,他的中介性挑战了人类与非人类的分类法。“存在于西方传统中的范畴及边界规定了什么是‘人’,什么是‘动物’,《天沟森林中的绿林好汉》对此进行了意义深远的批判。”^[16](P67)长期以来,对于人性的界定是以非人类的他者作为参照的。与非人类的野蛮相比,人类就是文明进步的,作为人类就是要克服动物性。这种非此即彼的二元论是人类中心主义的反映。“人类利用动物来解释何谓人,并揭示他们与自然界,尤其是与动物之间的差别。”^[17](P4)然而,现代科学恰恰揭示了人类与动物存在相当多的共同点。

小说的动人之处是斯科德与人类交往并建立友谊的故事。《天沟》从斯科德与两个人类的孤儿埃克和诺贝尔相识开始,他们在艰难的环境中相互帮助,渡过了一个又一个难关。埃克和诺贝尔教会了斯科德人类生活中的种种规则,让他认识到人类的多面性。斯科德也利用自己的超自然能量,帮助他的人类朋友获得食物,在森林中躲避各种危险。到小说的最后部分,斯科德爱上了一个叫齐妮娅的女人。她出生在一个富足的家庭,却郁郁寡欢,在旁人眼中,她举止怪异,精神有些失常,但是斯科德却对她一往情深。他们的爱情消弭了简单的类属划分,批判了传统文化中人性与动物性、文明和自然的二元论。爱赋予斯科德以人类的灵魂,但是他再也不能保持长生不老的状态,他终会像人类一样死去。

斯科德名字的瑞典语原文叫做“Skord”,是“skog”(森林)和“ord”(单词)的结合。森林代表自然,

①这部小说有时被翻译成《斯科拉森林中的强盗》,参见吴元迈主编《20世纪外国文学史》(第5卷)(译林出版社2004年)。作者请教了瑞典翻译家陈安娜(莫言等中国作家的瑞典语翻译)和他的丈夫陈迈平,他们建议使用此译名。

语言代表文明。所以,这个名字具有象征意义,代表永恒的自然世界与感知的人类世界的交叉和融合。一方面,为了与人类交流,斯科德必须首先学会用语言来表达自己的思考和感受,然后将那些零乱的、杂乱无章的事件连接成有意义的序列,从而达到认识世界和解决问题的目的。在这个过程中,他不得不逐渐失去与自然直接沟通和交流的能力,他的体验范围也随之缩小。另一方面,他始终保持着与动物沟通的能力和魔力。因此,他需要在人类和山妖之间保持一种平衡,能够融合人性与动物性。为了这个目标,他一直在努力。在小说的结尾,斯科德回到天沟森林,等待着自己的死亡。此时,小说开头出现过的那位巨人格勒宁(Groning)再次出现^[18](P483)。“Groning”在瑞典语中意味着“萌芽”,于是自然界经过一个生命的轮回孕育着新的开端。它的引申意义可以理解为斯科德的死亡是另一种形式的新生,代表人类智性和直觉的融合。至此,小说的叙事完成了一个循环。

在《天沟》中,斯科德从山妖蜕变成人是一个跨越性的文学事件,构成小说发展的主线。这一事件的意义不仅在于它颠覆了北欧神话传统中的山妖形象,更重要的是它创造性地将历史和人性的反思融入斯科德这一形象中。作者借助这一“文学的发明”(阿特里奇语)对全球化时代自然的破坏和人类的异化提出批评。英国文学理论家伊格尔顿在《文学的事件》(2012)一书中认为文学叙事里的言语行为也是操演性的,不仅仅是描述一个虚构的世界,而且通过它的叙事让一些事情发生了。这当然不只是指观众情感上的变化,而且也关乎现实生活中的改变。“小说通过诉说来完成自己的使命。小说的话语行为本身赋予了小说以真实性,且能够对现实产生切实的影响。”^[19](P131-132)在《事件:文学和理论》(2015)中,伊莱·罗纳借用德勒兹的事件哲学来讨论文学与现状的关系。“德勒兹分析文学个案,不仅是为了强调它们的独特性,更是为了找到一种独特的生成性的表达方式,并揭示它的创造力:生成性究竟如何在一整个内在性的平面内横贯写作过程并影响写作事件?”^[20](P157)《天沟》中山妖斯科德的人间传奇是一个有独创性的事件,能对读者的自然观和生态观产生一定的影响。

在全球化时代,人们发现科技进步有时竟阻碍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甚至对于自然和环境产生严重破坏,此时他们才意识到重新建构我们的生态保护意识是何等重要。生态批评呼吁人们重新发现自然,通过自己的直觉去亲近和感受自然对于人类的平衡发展和文明的进步至关重要。动物性研究认为,“一个人的动物本能对于理解人的行为是至关重要的。”^[14](P499)《天沟》在这方面是有启发意义的:“斯科德意识到,想要通过智识、科学和哲学去理解时间与物质终究是不可行的。但他仍能依靠直觉去理解世界,能在与他人的关系中找到意义。当他学着重新珍视自己属于山妖而非人类的一面,学着去相信自己的直觉,他便真正成熟了。”^[21](P301)换句话说,人类总是需要在理性知识与感性经验之间寻求一种平衡。小说从历史的角度批评和质疑人类中心主义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尤其是那些支撑文明大厦的基础概念,比如,主体、客体、自然、文化以及在这些概念的基础上建构的规范和制度。在这一点上,《天沟》与深层生态学的哲学主张是一致的,体现了北欧的文化特色,是生态文学全球在地化的一个典型。

三、都市中动物的权利:《山妖:一个爱的故事》

小说《山妖:一个爱的故事》在2000年获得为芬兰语小说写作而创立的“芬兰奖”(The Finlandia Prize)。作者斯尼萨罗(Johanna Sinisalo)生于1958年,这是她的第一部小说。之前她主要为电视和连环漫画写作,曾多次获得最佳芬兰语科幻小说“Atoros”奖。此外,她还在“凯米全国连环漫画创作大赛”上夺得过一等奖和二等奖。

这部有科幻色彩的小说的主要场景设置在芬兰一座城市的公寓楼里,主人公名叫安格尔,是一位年轻的摄影师。小说情节比较简单:安格尔在清晨回到住处,在公寓楼院子里发现一群十来岁的少年在踢打一个受伤的年幼山妖。出于怜悯,他将小山妖带回自己的住处。安格尔一开始不了解山妖,只是同情他,后来慢慢熟悉了,开始喜欢他,觉得他像人一样具有丰富的情感世界。于是,安格尔给他起了一个名字叫“佩西”。同时,安格尔也想利用他,拍摄一些独一无二的照片,获取利益和名声。可是有一次,佩西为了帮助安格尔抵御他朋友的攻击,而将对方杀死。警察要来抓捕,安格尔决定护送他离开,带着他

逃离都市,进入大森林。在森林里,安格尔惊奇地发现自己并不觉得恐惧。当小山妖佩西找到他的家庭的时候,前来搜捕的警察也跟踪而来。直到安格尔面临危险的处境,佩西和他的家庭邀请他留下来。他稍加思索,便决定加入山妖的家庭。

这本书在写作形式上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后现代碎片化的叙事方式,虚构的和非虚构的各种文体混杂在一起。为了调查所谓的山妖习性,安格尔翻阅了大量资料,包括日记、网络文章、新闻报道、神话传说、生物学著作等等,其中甚至还包括一段引自塞尔玛·拉格洛夫的小说《山妖与人类》里的对话^[22](P47)。这些有关山妖的文章或者引用文献以单独的篇章出现在小说里,与人物的叙事截然分开。这种碎片化的写作风格类似高行健的小说《灵山》,而且在目的上也是对主流文化的反思和批评。《山妖》将作者创作的或者引用的有关山妖的文本混杂在一起,一方面介绍人们对山妖的知识和想象以及这些如何决定他们对于山妖的认知;另一方面,读者也体会到这些知识和想象往往与事实不符,充满了人类的偏见和局限性。“小说中对山妖元素的运用以及与山妖相关的所有神话‘包袱’,都表明幻想的力量绝不亚于生物现实。安格尔在研究山妖时阅读的文本,以各种媒介形式创造了有关山妖的各类观点,它们实质上展现了语境是如何影响再现的。”^[23](P58)当然,作品的一个重要主题是批评了人类中心主义视角下动物和自然的他者化。叙事的碎片化不仅解构了人类对于动物的统一认识,而且也影射人与人之间交流的障碍。作品里的不同人物都在用第一人称叙事,但是每个人物的一次故事只有短短的一两页,中间穿插着其它各式各样的文本。这些人物之间的叙述经常相互矛盾和冲突,意在表明人与人之间的隔阂,同时暴露了城市生活的条块化和封闭性。在都市中,人与人的关系尚且如此,人与动物之间更是有天壤之别。动物成为都市空间不可接受的“异类”,这是对全球化时代都市化的一个控诉。

山妖的故事影射了生活在都市中动物的境况。都市一般作为文化与秩序的象征,成为自然的对立面。生态哲学家苏普(Kate Soper)曾经说过,在多数人眼中“都市或者工业化的环境”与“荒野”“乡村”是对立的,这种观念成为我们认识自然(包括动物)的障碍^[17](P3)。其实,都市里面也可以有荒野和野生的动物。都市也是一个生态系统,不应该是自然的对立面。城市与自然的二元论是有问题的,是全球化时代人类文化的一种畸形发展。“城市化势不可挡,野生动物被迫适应不断变化的自然环境,人们也渐渐开始关注这类问题,斯尼萨罗的书便诞生于这样一个历史时刻。”^[17](P48)进入都市的动物以一种不同以往的方式被他者化,处于人类的暴力之下,就像小说开头几个少年折磨幼小的山妖那样。当然,这种暴力必定遭到动物的反抗。小说的最后一幕:在森林中,当警察追捕的时候,高大的山妖们手里拿着枪。山妖属于大森林,但是人类在砍伐森林,森林不断变小,动物在失去自己家园。人类必须尊重动物的家园,因为动物不仅是我们生态系统中的成员,也是人类认识自己的一面镜子、一种途径。在这里,全球化进程中森林面积的减少成为小说的又一个主题。

人性和动物性过去一直被认为是相互排斥的,可是实际上它们之间的关系要复杂得多。正如唐娜·哈拉维在《当物种相遇》中所写的,“生命诞生于真实的相遇。”^[24](P67)《山妖》这部小说以一种虚幻和真实相结合的方式讲述了一次人与动物邂逅的奇特故事。“安格尔不由自主地注意到佩西拥有类人的外表、情感,有时甚至是智识,尽管它也明显带有山妖的动物性特质。”^[23](P55)山妖在小说中渐渐地被赋予人类的特征。安格尔是一个专业摄影师,他让佩西穿上牛仔裤,跳起来,拍一张广告照片。山妖照片获得惊人的成功,它随后获奖并成为本地知名球队的徽标。尽管人们恐惧山妖,抱有偏见,但是人们向往和崇拜山妖在跳跃中绽放出的巨大能量。有趣的是,当杂志发表后被寄送到安格尔家里来时,佩西发现了照片,变得无比愤怒而将杂志撕毁。安格尔说:“他看到了。他知道那是什么。他知道怎么看照片。他恨透照片了。至少他恨透这一张了。”^[22](P220)我们无法对山妖的这种激烈反应加以确切的解释,但是这无疑在表明他是有丰富情感的,他有一定的判断力,并且不受人类的影响。遗憾的是,我们对于他的内心世界所知甚少。小说还有一个奇怪的细节,山妖通过它的气味对安格尔产生性的吸引力。安格尔不仅陶醉于此,而且对山妖有性欲望和“性行为”^[23](P166)。人与山妖的性接触在易卜生的戏剧里也曾出现过,培尔·金特被女山妖勾引,打算放弃人类的身份去当山妖大王的女婿。在这

里,人与动物的界限模糊了。如果说《天沟》描写了山妖如何变成了人,《山妖:一个爱的故事》则在一定程度上讲述了人“成为动物”的故事,或者说一个寓言。在合著的《千高原》中,德勒兹(Gilles Deleuze)提出“成为动物”是为了挑战人类与动物的区隔,提倡跨物种的超越与迁移,进而实现人与动物的“联盟”。“成为动物不是梦想,也不是妄想,而是彻底真实的……成为不同于遗传,它与联盟有关。”^[17](P11)在这个意义上,人类走出了自己的认识局限,面对自然界无限的可能,开放自己的襟襟。

《山妖:一个爱的故事》里的“爱的故事”是一个不易解释的命题,这是因为在小说中爱的传递和爱的表达是非常多面性的。“爱”改变了安格尔和小山妖佩西的命运,也将他们连接在了一起。同时,“爱”也用来描写山妖之间的感情。以下是佩西在回到森林里,即将与山妖家人重逢的描写:“突然他呆住了,尾巴以我从未见到的方式摆动,它卷成了半圆型,绷得紧紧的,我感觉他既有些兴奋,也有点紧张,还表达了……伟大的、深沉的爱。”^[22](P269)在小说里,“爱”是整个叙事情件的灵魂。小说对性、身体与社会规范的颠覆性描写拓展了我们对人性/动物性、自然/非自然的探讨。它给读者的启发是动物性其实也是人类的一个话语建构,文明和自然的划分是人为的,而非本质性的。在这里,北欧山妖叙事的传统断裂了,产生有独特性的新形式。这一新的叙事形式既受到全球化的深刻影响,又深深打上了北欧文化的印记,反映了全球在地化的文化特点。

四、小 结

北欧当代山妖小说的研究揭示了北欧的山妖神话如何在最近的二三十年中被挪用和再创作,编织出风格迥异但又深具生态关怀的重要作品。借助艺术的想象和创新,并结合当下的全球化历史进程及其影响,山妖的故事生成了一系列有独特性的文学事件。这些文学事件不仅仅反映现实,而且积极介入全球化时代的各种社会问题,尤其是对生态文化的反思和建构,具体说来主要有以下几点:(1)山妖的叙事激发人们对于人性的反思,并认为人性和动物性之间的边界是模糊的。无论是《天沟森林中的绿林好汉》里的斯科德还是《山妖:一个爱的故事》的佩西,他们都同人类建立了友谊,甚至还生出爱情。(2)文明与自然二元论是一个人为的历史建构,它们不应该被认为是对立的,而是相互交融、相互促进的。尤其在 globalization 时代,人们需要重新认识和理解自然。(3)人类中心主义的生态观念不仅是固化于我们文化内部的一整套话语建构,而且社会的权力机构也在不断强化它的存在,因而反对人类中心主义是一项长期的任务。从事件的角度看待文学,能够突出文学的能动性,也即创新的文学生产如何能够参与当下对于全球化的想象与改造,尽管这种变化是缓慢的。

文化代表传统,事件体现创造性。事件在生成的过程中,往往会出现日常秩序的断裂,这是因为事件具有反叛性和批判性。根据齐泽克的观点,“事件总是某种以出人意料的方式发生的新东西,它的出现会破坏任何既有的稳定架构。”^[12](P6)北欧的生态文学通过山妖神话原型的改写,构建了一个文本的虚拟世界,见证了全球化的历史和现实,并试图对读者和社会产生积极的影响。一系列具有相似反叛精神的事件推动着文化的自我更新,文化在传承中得到重构和发展。当代北欧的这些重写山妖的文学作品在继承和发扬北欧本土文化的同时,批判了人类中心主义世界观和全球化带来的环境破坏,从而建构了一种独具特色的北欧生态文化,并已经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和贡献。北欧生态文学的全球在地化表明:文学可以利用本土的文化元素来思考全球化给世界和地区带来的冲击,并努力发挥文学的功能,为改变或者改造现实贡献一分力量。

参考文献:

- [1] V. Roudometof. *Glocalization: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New York: Routledge, 2016.
- [2] R. Robertson. *Globalization: Social Theory and Global Culture*. London: Sage, 1996.
- [3] A. Naess. *The Basics of Deep Ecology*. The Trumpeter, 2005, (1).
- [4] 佚名. 萨迦. 石琴娥, 斯文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03.
- [5] 佚名. 埃达. 石琴娥, 斯文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00.

- [6] J. Lindow. *Troll: An Unnatural History*. London: Reaction Books, 2014.
- [7] 易卜生戏剧集:第1卷. 潘家询等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6.
- [8] N. Frye, M. Dolzani. *Words with Power: Being a Second Study of the Bible and Literature*.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2008.
- [9] D. Attridge. *The Singularity of Literature*.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2004.
- [10] D. Attridge. *The Work of Literature*.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 [11] J. Landy. *How to Do Things with Fiction*. Oxford &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 [12] 齐泽克. 事件.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 2016.
- [13] 吴元迈. 20世纪外国文学史:第5卷. 南京:译林出版社, 2004.
- [14] M. Lundblad. *From Animal to Animality Studies*. PMLA, 2009, (2).
- [15] L. H. Rugg. *Revenge of the Rats: The Cartesian Body in Kerstin Ekman's Rovarna I Skuleskogen*. *Scandinavian Studies*, 1998, (4).
- [16] H. F. Scott. *Telling Tales, Testing Boundaries: The Radicalism of Kerstin Ekman's Norrland*. *Journal of Northern Studies*, 2014, (1).
- [17] R. Malamud. *Poetic Animals and Animal Souls*. New York: Palgrave, 2003.
- [18] K. Ekman. *The Forest of Hours*. trans. Anna Paterson. London: Chatto & Windus, 1998.
- [19] T. Eagleton. *The Event of Literature*.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2.
- [20] I. Rowner. *The Event: Literature and Theory*. Lincol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2015.
- [21] R. Wright. *Approaches to History in the Works of Kerstin Ekman*. *Scandinavian Studies*, 1991, (3).
- [22] J. Sinisalo. *Troll: A Love Story*. trans. Herbert Lomas. New York: Grove Press, 2003.
- [23] K. Jylkka. "Mutations of Nature, Parodies of Mankind": *Monsters and Urban Wildlife in Johanna Sinisalo's Troll*. *Humanimalia*, 2014, (2).
- [24] D. Haraway. *When Species Meet*.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08.

Glocalization, Event and Contemporary Nordic Environmental Fiction

He Chengzhou (Nanjing University)

Abstract: Glocalization in the ecological sense is to think globally and act locally, which gives rise to two questions: How to make use of the traditional culture? How to localize the issues of globalization and environment? A critical analysis of the glocalization of Nordic environmental fiction will offer us some clues. Trolls are the mythical archetypes of Nordic literature. Since the 1980s, there have appeared some fictional works that re-write stories of trolls, such as *The Forest of Hours* from Sweden, and *Troll: A Love Story* from Finland. In those works, trolls are used to create fascinating stories with new literary narratives. *The Forest of Hours* reveals that the animal instinct is of great importance for understanding individual persons, while in *Troll: A Love Story*, the troll story, which is narrated in postmodern, fragmented style, reflects the conditions of animals living in urban space. Through this Finnish story, one realizes that animality is but discursive construction and that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culture and nature is arbitrary. The innovation of troll narratives in contemporary Nordic fiction bears both the influence of globalization and the traditional culture, which is demonstrative of glocalization.

Key words: glocalization; literature of Northern Europe; troll; eco-criticism; *The Forest of Hours*

■收稿日期: 2017-10-10

■作者简介: 何成洲, 挪威奥斯陆大学博士, 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 欧洲科学院外籍院士; 江苏 南京 210093。

■责任编辑: 何坤翁